

## 《海国图志》初刻本刊行年代新考

莊 钦永

1838年6月2日，满洲六世大君道光帝接到其青睐、“遇事敢言”鸿胪寺黄爵滋上了一道《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吁请禁绝鸦片后，随即下旨，令各省督抚、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展开禁烟的大讨论。约半年后，1839年1月3日，道光帝授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使粤，办理查办鸦片事宜。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sup>1</sup>，林则徐一到广州，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先取得梁廷枏从海防局档案文书中摘录的有关海关大事的资料，再从广州巡抚怡良取得阮元的《广东通志》，并阅读刚于10多年前刊行谢清高的《海录》中有关英国的内容。从1839年7月至1840年10月底卸职期间，林则徐通过梁进德向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5-1871）与美籍商人金查理（Charles King）索讨地图、地理学，以及新教传教士书写的中文书刊，<sup>2</sup>并聘请四位中国助手<sup>3</sup>翻译英文图书报纸，把苏格兰人慕瑞（Hugh Murray, 1779-1846）的《世界地理大全》（*Encyclopedia of*

---

\*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承日本关西大学沈国威教授寄赠该校田野村忠温教授大作《『海国图志』版問題新論—従来未知の版区別の発見とその含意—》（刊载于《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63卷[2023年2月]）供余参考，笔者在此敬展谢忱。

<sup>1</sup> 《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贵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册，第29～30页。

<sup>2</sup>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2-243.

<sup>3</sup> 他们是袁德辉（Atih）、梁进德（Shaou Tih）、温文伯（Aman）及容林（Alum）。有关这四位翻译员之生平考证，读者可参阅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台北：斯福斋，2016，第24～41页。有关 Aman、Alum 的中文姓名，林永侯分别译作“亚孟”、“亚林”，学者多沿袭使用，其实不正确。有关 Aman，美国汉学家马世嘉（Matthew W. Mosca）认为他应是《洋事杂录》里“广东民人曾到孟（左加口）呀啦，回粤以近三十年”的温文伯。笔者赞同此说法，粤语“阿”读作 A，“文”则读作 man。又笔者认为 Alum 即是《洋事杂录》中译者之一的“香山南屏村人，到过英（左加口）咭喇”的容林。“林”粤语读作 lam。参阅林永侯：《论林则徐组织的译工工作》，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第121、123页；林则徐译：《洋事杂录》，载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10册《译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第364、371页；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242 & 258 note 23; 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xiii, 11.

Geography) <sup>4</sup> 的部分内容译成中文; <sup>5</sup> “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sup>6</sup>, 密为译出, 藉以“定控制之方” <sup>7</sup>。

不料, 1 年后, 1840 年 8 月 19 日, 道光帝收到英国外相巴麦尊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那份将近 4000 字的照会, 在短短的两天之中, 经过“详加批阅”, 原是一意主“剿”的他, 竟然完全转变, 改而倾心语“抚”, 转眼间以“误国病民, 办理不善”的罪名, 将这位曾是他隆信、眷顾的大臣林则徐革职, 被令发配远谪新疆伊犁充军。 <sup>8</sup>

1841 年 5 月 2 日, 为准备踏上的漫漫长路, 林则徐开始料理书籍。面对许多书刊, 苦难尽带, 只好分赠友人, <sup>9</sup> 随身仅携带 20 筐的书籍与洋务资料译稿, 怀着无比凄怆的心情, 离开广州。8~9 月, <sup>10</sup> 赴戍途中, 经长江下游繁华府城京口 (今江苏镇江) 时, 他的挚友魏源 (1794-1857) 正好在那里参与筹划徒阳河修浚工程。自江苏话别六载后, 两位忧国忧民有识之士再次相晤。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 两人同宿一室, “与君宵对榻, 三度雨翻苹” <sup>11</sup>, “万感仓茫日, 相逢一语无”, 就时局与未来彻夜长谈, 感叹万千。林则徐以托孤的心情, 把部分洋务译稿《四洲志》等以及在广州所搜集到的资料送给魏源, <sup>12</sup> “属编《外国地理志》”, 让更多人睁眼看域外世界。魏源欣然接受这托

---

<sup>4</sup> 吴义雄:《鲍留云与西方经济学的初传》,《大变局下的文化相遇:晚清中西交流史论》,中华书局,2018,第46页。

<sup>5</sup> 魏源《海国图志》称之为《四洲志》或《四洲地理志》。林则徐原有意刊行《四洲志》,让全体中国人共享这项新知。参阅《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十六《大西洋·荷兰国沿革》,第23页a;苏精辑著:《林则徐看见的世界》,第38页。

<sup>6</sup>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中华书局,2018,上册,第172页。

<sup>7</sup> 《两广总督林则徐奏为贵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情形片》,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9~30页。

<sup>8</sup>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三联书局,2014,第164~173页。

<sup>9</sup> 林则徐:《致怡良》(写作1841年5月3日[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二日],广州),载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7册《信札》,第275~276页。

<sup>10</sup> 杨国桢:《林则徐大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57页。

<sup>11</sup> 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下册,第761页。

<sup>12</sup> 这些资料包括普鲁士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的《贸易通志》及其编纂的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凡9期,即道光癸巳年十一月、甲午年二月、乙未年正月、丁酉年四月、七月、十一月及十二月等期号)、高理文(即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及郭实猎等译《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等等。以往我们总以为,林则徐把从广州北上所带的洋务资料全都交给魏源,其实这是误解。1842年9月,林则徐远戍伊犁,在甘肃行程中,由甘肃省安定县主簿陈德培(字子茂)自兰泉陪送至凉州,9月26日,两人就此分别。据陈德培《洋事杂录》跋文记载,林则徐雇了大车7辆,将他的行李直运送至乌鲁木齐。在这些行李中,各种书籍就有20筐之多,包括大量的洋务资料译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林则徐提供与魏源的资料仅是他在广州所搜集到的一部分。参见林则徐:《子茂簿君自兰泉送余至凉州,且赋七律四章赠行,次韵奉答》,《林则徐全集》,第6册

付，预定几个月后的冬天脱稿。<sup>13</sup>就在展纸动笔、伏案折节不久后，魏源改变想法，继续搜求历代史志及元、明已降华人岛志和海外见闻录等巨帙零章，最终写成一部五十卷的重要的著作——《海国图志》，向中国人全面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文化、军事及经济等概况。

究竟《海国图志》初刻本在什么时候付梓刊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最早的刊本，牌记均镌刻“道光甲辰仲夏古微堂聚珍板”，道光甲辰年即西历 1844 年，仲夏即是农历五月，相当于西历 6~7 月；其序言则志曰“道光二十有二载，岁在壬寅嘉平月”。嘉平月即农历十二月的别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即公元 1843 年 1 月（为行文方便，以下笔者称之为 1842 年说）。牌记与序写作日期，两者相差 1 年 5 个月。然而在这两者之间，绝大多数学者选择后者即是《海国图志》初刻本的刊行年代。换一句话说，学者认为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资料后，伏案折节，断断续续只用了短短约一年半的时间，就在 1842 年 8 月 29 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4 个月后，就完成了 57 万言的煌煌巨著。这种说法沿袭了半个多世纪，几成定论。<sup>14</sup>

十多年前，致力于西域文史研究的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赫然在一本名为《大兴徐氏同人书札》<sup>15</sup>里，发现 3 通魏源写给老师徐松（1781-1848）的书札，就此写成《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推翻了《海国图志》刊成于 1842 年的说法。<sup>16</sup>这事在《海国图志》研究史上意义非凡，朱先生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近日，笔者因致力于《海国图志》与郭实猎《万国地理全集》的关系，看了一些史料后，仔细拜读朱先生之鸿文，随即草成此文，与朱先生的看法略有不同，就正于方家学者。

#### 刊行年份再考

在未进入正式考证之前，我们先简略引述魏源三通书札有关《海国图志》编纂进展的段落。

---

《诗词》，第 214 页；孟彭兴、林永保：《新发现的〈洋事杂录〉述论》，《学术月刊》1985 年 12 月号，第 67~68 页。

<sup>13</sup> 魏源致贺熙龄书（写作日期：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四日[1841 年 11 月 16 日]），载夏剑钦：《新发现的魏源致贺熙龄书信二通》，《历史家茶座》2008 年第 1 辑，第 129 页。

<sup>14</sup> 例如王家俭：《魏源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第 82 页；李汉武：《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第 100 页；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 438 页；贺双非：《〈海国图志〉的作者及版本研究》，《四川图书馆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 61 页；周玉柳：《魏源——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大师》，载邵阳市魏源文化艺术研究院编纂：《魏源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启蒙》，团结出版社，2020，第 19 页；雷环捷：《晚清铁路认知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第 70 页，等等。

<sup>15</sup> 吴德襄藏本，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本。

<sup>16</sup> 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4 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 339~353 页，后收入氏著《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中华书局，2019，第 267~288 页。本文所引据中华书局版。

第一通书札。写作时间：1842年初春。时魏源在扬州。1840年，魏源入都参与会试，不售。<sup>17</sup>当时已到年花甲之年，担任文渊阁检阅官、西北地理学家徐松正在编撰《顾炎武年谱》，听说南方学者也曾编纂此谱，因此他请求魏源南归之时，代为搜集顾氏资料，以便校勘。自1841年夏，魏源从林则徐手中接过《四洲志》等资料，至今已经约10个月了，乘赵振祚<sup>18</sup>入京师之便，魏源给老师徐松写了这通信札，报告搜集年谱资料情况之时，也提及他著书之进展，云：

近撰《圣武记》六卷，已脱稿；《海国图志》十卷，春杪亦可就绪。<sup>19</sup>

该年8月，40万余言的《圣武记》初刻本刊行了。12月，魏源送给陕西巡抚李星沅一套。<sup>20</sup>隔年，又送一套予徐松。

第二通书札。写作时间：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即1843年5月5日，时魏源在扬州。又过了一年二、三个月，魏源又再写信给徐松。1842年11月，徐松补授嘉兴知府。因回避原籍，刚在4个月前调任陕西榆林知府。在信中，魏源又向老师汇报《海国图志》编著进展：

源去岁寄撰《圣武记》十四卷，未及就正，妄灾梨枣，缪漏繁多，敢求训定。尚有《海国图志》十馀卷，未尽脱稿。今冬或可邮呈左右。<sup>21</sup>

信札中，魏源也向徐松请教《圣武记》中提及的乌兰布通、<sup>22</sup>曷劳落迦<sup>23</sup>等的地望问题。此时，魏源估计大概不太可能在秋冬间付梓印行并寄出，于是在上引第二通书札中，他向徐松说：“尚有《海国图志》十馀卷，未尽脱稿。今冬或可邮呈左右”。他把寄出《海国图志》的时间挪后，从“秋冬”改为“今冬”。“或可”二字显示此时他还不是那么有把握一定会在该年冬季寄出。

第三通书札。写作时间：原书札未署日期。唯据朱先生考证，当在1844年殿试之后即将离京回扬州之前。魏源在书札中向徐松说，他寄呈《海国图志》一部予他，并藉此机会向他讨教有关其《西域水道记》中提及宽田吉斯海的地望问题：

<sup>17</sup> 1840年，魏源北上京师应试之事，是据朱玉麒先生之考证。

<sup>18</sup> 赵振祚为清代经学家刘逢禄之甥、著名史地学者张穆的妻兄。

<sup>19</sup> 朱玉麒：《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第269页。

<sup>20</sup> 《李星沅日记》1822年12月5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记：“魏默深来，贻所刻《圣武记》一套。”参阅（清）李星沅著，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第448页。

<sup>21</sup> 朱玉麒：《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第272页。

<sup>22</sup> 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

<sup>23</sup> 故址在今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尾干涸三角洲荒漠中的卡尔墩古城。

去岁寄拙刊《圣武记》一部，由石梧中丞转致，谅已达览。顷从张石洲兄处得读吾师手言，垂及不肖，良感记注。今春一第，复被磨勘，来春方许殿试。只得先暂出都南旋，来年再作冯妇。得失见惯，无足言者。

惟《海国图志》五十卷脱稿，因道远，不及就正有道，即用聚珍板印百部于扬州。谨寄呈一部。其中校对草略，讹误百出，只好俟奉指诲，再行遵改，以便重印。

前读吾师《西域水道记》，有论元兵征钦察绕宽定吉思海一条，……。《记》中未载明出典，则末学无从引用。伏求指示，千万祷切。其札即交石洲，或再作一札，寄江宁府转交候补知府魏源亦可收到。……。<sup>24</sup>

立足于第二、第三书札，朱先生得出以下结论，说：

在魏源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给徐松的信中，提及“尚有《海国图志》十馀卷，未脱稿。今冬或可邮呈左右”。可见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海国图志》已经大体完成，因此魏源的序呼之欲出，先期写就。但是局部的十馀卷，在道光二十三年四月还“未尽脱稿”，按照作者的计划，是“今冬或可邮呈左右”，即在道光二十三年年底可以付梓印行。实际邮呈徐松的《海国图志》，或许因为赴京应试而滞后，最后是在道光二十四年才正式寄出。因此，《海国图志》最初的版本，印行时间最早也当在二十三年下半年。以往的道光二十二年说应该予以纠正。<sup>25</sup>

朱先生的结论是有一定根据的。1843年3月20日，魏源致当时主讲湖南常德朗江书院的同郡师友邓显鹤（1777-1851）的信中说：“托空言以征往事，遂成《圣武记》十四卷、《海国图志》十五卷，先刊成一种，呈请海正，俟俟秋冬续刊再寄。”<sup>26</sup>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晚号南村老人。湖南新化下渡村（今新化县曹家镇梓木冲村）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1814年春，他与魏邦鲁、魏源父子从家乡北上京师。时魏源年方20。1826年邓显鹤又与这位“爱我如昆弟”的魏源入都同应礼部会试，不第。后授宁乡县训导，任教职13年。邓显鹤毕生致力于湖南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刊刻，编纂《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书。魏源向邓显鹤问学，以师礼敬重

<sup>24</sup> 转引自朱玉麒：《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第276页。

<sup>25</sup> 朱玉麒：《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第281页。

<sup>26</sup> （清）魏源撰，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第12册，第749页；熊焰：《魏源年谱新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377页。

之。当邓显鹤编辑的《资江耆旧集》时，魏源协助搜访、提供资料，互相切磋，成就不朽盛业。

27

仔细拜细读朱先生之鸿文，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他似乎认为在道光二十三年年底，《海国图志》是按照原先的写作计划，如期付梓刊印，但“或许因为赴京应试而滞后，最后是在道光二十四年才正式寄出”。惟笔者据与魏源有同乡之谊、时任职国史馆提调何绍基（1799-1873）日记推测，结论与朱先生略有差异。

（1）1842年，何绍基丁父忧期满，回到京师，就职国史馆。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蝮叟。湖南道州人。比魏源小5岁。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散馆授编修。历官武英殿主校、国史馆提调。1822年结识魏源，并作诗勉励他参加是年乡试。何绍基与魏源俩都是在以陶澍为中心的湖湘士人群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魏源北上京师参加礼部会试时，都与何绍基等三三两两“邀酌”、隔三岔五的“宴集”。1843年，何绍基与张穆在京师筹建顾炎武祠，魏源是顾祠会祭的成员。魏源离世后，何绍基为其订遗集。

一年多后，1844年4月中（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底），魏源抵达京师应礼部会试。如果说《海国图志》是在1843年年底就已付梓刊行，依一般推理，魏源理应会随身携带几套，或用以持赠师友，或寄放给琉璃厂书店代售。但是，魏源没有这样做，而是仅携带有待核对或修改的《海国图志》文稿若干稿。1844年4月15日，何绍基在日记里写道：“早访晤魏默深。”<sup>28</sup>这是魏源甫入都后第一次与同乡好友何绍基见面。翌日，4月16日，何绍基在日记又云：“上馆（引者按，指国史馆），带《廓尔喀纪略》十本。”<sup>29</sup>何绍基不是西北史地学者，为什么要从国史馆带出《廓尔喀纪略》？合理的推测，那是魏源昨天与他见面时向老友的请求，为要修订《海国图志》文稿中有关印度篇章与绘制五印度地图。4月26日，殿试考过了，魏源开始忙着修改《海国图志》一些篇章。5月4日，何绍基在日记上记云：“早过魏默深，见其《海国图志》稿数篇”<sup>30</sup>12日，日记又记云：“默深处看其画五印度图。”<sup>31</sup>这幅地图后来出现在《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叫做《西南洋五印度沿革图》<sup>32</sup>。何绍基日记中的这几则史料最有力地、直接地证实，迟至1844年5月《海国图志》尚未刊行。

---

<sup>27</sup> 参阅熊焰：《魏源家世与师友考》，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第143~152页。

<sup>28</sup> （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岳麓书社，2023，第394页。

<sup>29</sup> （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第394页。

<sup>30</sup> （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第399页。

<sup>31</sup> （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第401页。

<sup>32</sup> （清）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海国沿革图五》，道光甲辰（1844）仲夏古微堂聚珍板，第15页a~15页b。《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删去这图。

(2) 在 1844 年 2 月 17 日，那天正是大年除夕，何绍基日记写道：“早写小楷十馀行。饭后到海秋处，取默深所寄到《圣武记》，共四十二部，分得十部。”<sup>33</sup>如果《海国图志》已在 1843 年下半年付梓印行，为什么魏源不将刚印就的《海国图志》与《圣武记》一并寄给何绍基？

(3) 1843 年 2 月，台湾道姚莹被诬陷以“冒功”罪，遭革职拏问，4 月 4 日，他被带回内地。10 月，“台湾之狱”世间在京师引起大震动。10 月 6 日，姚莹入刑部狱。17 日，素不认识的国史馆编修的何绍基去牢狱探视他。<sup>34</sup>就在几天前，13 日，何绍基给在扬州的阮元老师与情同手足的魏源写信，<sup>35</sup>托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张穆带去。11 月，张穆抵达扬州，拜谒阮元，也见了魏源，把何绍基的信都转交给他们俩。<sup>36</sup>12 月 30 日，张穆回到京师时，把阮元的覆函及其著作《擘经室再续集》一册，并魏源的覆函及《寓公诗草》二册交予何绍基。<sup>37</sup>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魏源没有托张穆把《海国图志》转交与何绍基或在京师的师友。这证实迟至 1843 年 11 月，《海国图志》尚未刊行问世。

(4) 《海国图志》初刻本并非在 1843 年年底刊行问世，从魏源寄赠《海国图志》给师友均在 1844 年 9~10 月（二十四年八月）或之后可以佐证。以下仅列举 5 个例子。

例①。1844 年 9 月 16 日（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五日），魏源在京师写了一通信给当时在邵阳主讲濂溪书院的好友邓显鹤，说他托小云侄世兄将一部《海国图志》寄呈以求教。<sup>38</sup>小云当是朱壬林（1780-1859）。朱氏原名霞，字礼卿，号小云，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官直隶清河道，署按察使。著有《晚学文稿》、《小云庐诗稿删存》等。

例②。同样是在 1844 年 9~10 月，就在离京南归前（当在 10 月 20 日[九月九日]）之前，因为当天顾祠秋祭，与祭者名单中未见魏源名字<sup>39</sup>，魏源托抗直敢言、顾祠会祭祀的成员朱琦（1803-1861）御史将《海国图志》代呈朝廷，以整顿边防。不料，朱琦婉拒他的请托。朱琦《寄魏默深刺史》云：“魏子别我时，授我书一编。谓是海国志，幽遐靡弗宜。……所惜身卑微，无由达天关。捆载悉见付，谓我宜代陈。……天聪倘易达，无俟予小臣。”<sup>40</sup>朱琦，字伯韩，号濂甫。广西临桂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授编修，改御史。著《怡志堂文集》、《怡志堂诗集》。

<sup>33</sup>（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第 375 页。

<sup>34</sup>（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第 349 页。

<sup>35</sup> 关于魏源与何绍基之深重情谊，读者可参见熊焰：《魏源家世与师友考》，第 166~172 页。

<sup>36</sup> 王章涛编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第 995、996 页。

<sup>37</sup>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12 月 30 日）条。参见（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第 349、364~365 页；王章涛：《阮元年谱》，第 995 页；（清）张继文编，罗凯点校：《先伯石州公年谱》，载张正明、安介生主编《张穆全集》，三晋出版社，2019，第 4 册，第 277 页。

<sup>38</sup>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中华书局，2018，第 898 页。

<sup>39</sup> 参阅《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1918 年石印本。

<sup>40</sup> 学者对朱琦《寄魏默深刺史》一诗的写作日期有两种说法，李瑚认为是在 1845 年。熊焰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在朱琦《怡志堂诗初编》里，《寄魏默深刺史》之前一首诗是悼念汤鹏的《浮邱子輓歌》，

例③。从朱玉麒先生所引魏源给徐松的第三同书札，我们知道：同样是在八月初前后，魏源寄赠给徐松《海国图志》一套。<sup>41</sup>

例④。大约在 1844 年 12 月~1845 年 1 月（道光二十四年年底十一、十二月），魏源又寄赠姚莹《海国图志》一套。<sup>42</sup>姚莹《康輶纪行·自叙》：“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熊焰认为姚莹是在 1844 年秋取得《海国图志》。笔者认为不是。按，姚莹在四川，有两次奉使乍雅（一作乍丫，即察雅，今四川察雅县东），抚谕番僧。一次是在 1844 年九月，清廷委任姚莹赴里塘调节乍雅两呼图克图纷争事，姚莹固辞。另一次是在 1845 年 3 月 18 日（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上谕批复，摘去蓬州知州姚莹顶戴，随同宁远府知府宣璜、候补通判丁淦再往乍雅查办。4 月 1 日（二十五日），再自成都出发。姚莹在《自叙》言此次“欣

其后第五首则为《得石甫至蜀书，不忘万柳旧游，因题其后》。汤鹏卒于 1844 年 8 月 22 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姚莹于是年孟秋入蜀，即姚莹致朱琦书当作于是年仲秋。又诗中云：“凉秋事稍暇，按图窥九边，则朱琦寄魏源诗约作于暮秋。熊焰之考证极为正确。笔者再作一补充，按汤鹏离世的噩耗传到京师当在八月初，10 月 18 日（九月初七日），在贵州贵阳典试的何绍基收到家人写于 9 月 14 日（八月初三日）的信，告诉他汤鹏猝病而亡。据此，熊焰推断《寄魏默深刺史》的写作时间可定得狭窄一些，即 10 月（八月）之后。参阅李瑚：《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第 393~394 页；熊焰：《魏源年谱新编》，第 412~413 页；（清）何绍基撰，毛健、尧育飞整理：《何绍基日记》，1844 年 10 月 18 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初七日）条，第 447~448 页。

<sup>41</sup> 魏源致徐松的第三通书札未署写作日期。朱先生据“今春一第，复被磨勘，来春方许殿试。只得先暂出都南旋，来年再作冯妇”，推断书札当写于道光二十四年；又从“顷从张石洲兄处得读吾师手言”，推测这信“似亦在殿试之后即将回扬州之前”，这推断是正确的。笔者案：殿试是在四月初举行。魏源告诉徐松，其覆函可“即交石洲（引者按：即是张穆），或再作一札，寄江宁府转交候补知府魏源亦可收到”。之所以如此交代，因为何绍基在五月初一日，接圣旨到贵州担任副考官，五月二十四日（7 月 9 日）出发，须要大半年才回京，所以就请徐松把信寄给张穆转交；在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44 年 6 月 8 日），魏源接奉上谕，准其以知州分发江苏补用，当时魏源应该尚在等待扬州寄《海国图志》至京师，他还没决定几时出都到江宁上任。据此，我们可以把这通信札的写作时间定得更狭窄一些，即信札写作时间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考虑到魏源寄给邓显鹤是在八月初五日（9 月 16 日），而托朱琦代陈朝廷是在八月出都之前，当可推断《海国图志》是在七月底、八月初从扬州寄达京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魏源寄赠徐松也是在八月初前后。参阅朱玉麒：《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第 276 页；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1844 年 6 月 16 日）条，《何绍基日记》，第 411 页。

<sup>42</sup> 魏源寄赠给姚莹的《海国图志》当是五十卷本，惟在《康輶纪行》卷五《外夷形势当考地图》说是六十卷。按，《康輶纪行》初稿撰成于 1846 年，原名《康卫纪行》，姚莹甚感不满意。于是在 1848 年夏，开始整理修订，厘为十六卷，由叶棠校对并作《跋》。此处“六十卷”当是叶棠校对时误改。参阅（清）姚莹撰，刘建丽校笺：《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 167 页。

然奉使”。不言而喻，当是指第二次，逆推上去，我们可以确定魏源寄出《海国图志》时间约于1844年冬，姚莹收到书则在第二次乍雅之役出发（1845年3月18日）之前。<sup>43</sup>

例⑤张维屏。就在寄赠给姚莹的差不多同一个时候，<sup>44</sup>魏源也寄赠《海国图志》一套给对域外輿地之学有兴趣、远居在广州的张维屏。此时，张维屏辞官归里已有9年。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一字南山，号松心子，晚年自号珠海老渔。诗文曾署楚客、第七洞天樵客、唱霞渔者、花村老圃、南山道人。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一生见证清廷四朝，从乾嘉盛世至道咸衰世。他与黄培芳（1779-1859）、谭敬昭（1817年进士）并称“粤东三子”。1836年，因对吏治的黑暗，官场的乱象不满，告病辞官返乡，时年57岁。后任广州学海堂学长，讲学授徒，闭门著述，游园吟诗，以诗酒自娱。

魏源结识张维屏是在1830年。1829年，魏源北上参加礼部会试，因未能考中进士，捐资得入内阁中书舍人，留在京师，借阅史馆秘藏书。翌年，张维屏丁忧服阙，须参加吏部安排的抽签，以决定分到哪个省任职。6月（五月）抵达京师，<sup>45</sup>8月11日出都，在京逗留大约两个月。<sup>46</sup>7月21日（六月初二日），长期居住在京师的经世学者、诗人龚自珍召集了魏源、张维屏、周凯、张祥河、

<sup>43</sup> 李瑚据魏源《古微堂诗集》卷八两首诗与姚莹《南国》诗推断，姚莹取得《海国图志》“系在北逮以后，入川以前，即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之间，大约即使此次江汉送别时所赠。”熊焰认为“（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五日魏源尚在京师（有致邓显鹤书一通），五、六月至汉阳送姚莹入蜀在时间上似不太可能。”熊焰所言甚是。参阅李瑚：《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第577页；《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1918年方还影印本，第3~4页；姚莹：《自叙》，（清）姚莹撰，刘建丽校笺：《康輶纪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1、8~9、45~46、167页；施立业：《姚莹年谱》，黄山书社，2004，第311页。；熊焰：《魏源年谱新编》。第405~406页。

<sup>44</sup> 有关魏源寄赠《海国图志》予张维屏的年份，学界有三种说法，熊焰认为是在1844年，李瑚则认为是在1846年。惟据管林之考证，张维屏著《魏默深进士大书来以所著《海国图志》见寄，赋此奉报即题卷端》收在《松心诗集》壬集《花地集》卷三，在它之前两首《哭三儿（祥鉴）》、《重哭三儿》（祥鉴，字寿卿，号韶台，道光十九年举人）。《哭三儿（祥鉴）》诗中有“儿生在己巳，儿卒在乙巳。”乙巳即道光二十五年（1845），因此推知该诗写与1845年。严志雄也持此说。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据《重哭三儿》有“伤心时节近清明”，确知者诗写于二十五年二月底，在这两首诗之后第二首《哭四女（秀端）》，张维屏之四女卒于1845年九月或之后，故确知此诗作于1845年，逆推上去，魏源赠书与张维屏应在1844年底或1845年年初。参阅张维屏：《松心诗集》壬集《花地集》卷；李瑚：《魏源研究》，第398~399页；管林：《魏源与陈澧的交往》，《魏源文化》创刊号（2013年12月），第15页；严志雄：《鸦片、鬼兵、珠海老渔：晚清广东诗人张维屏鸦片战争期间所作诗管窥》，《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4期（2022年1月），第25~26页；熊焰：《魏源家世与师友考》，第248、250页；黄国声、李福标：《张维屏先生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第395~396、400、401页。

<sup>45</sup> （清）金菁茅编：《张南山先生年谱撮要》，第5页a。

<sup>46</sup> 张维屏在十月八日（1830年11月22日）回到广州。参阅张维屏：《十月八日到家作》，《听松庐诗钞》卷十六，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张南山全集本，第1页a~1页b；（清）金菁茅录：《张南山先生年谱撮略》，第5页b。

吴葆等在四周景色幽美的著名游览胜地龙树寺聚会。<sup>47</sup>当年魏源 37 岁，张维屏则是 51 岁的中年人。

1845 年夏收到《海国图志》后，张维屏赋诗《魏默深进士源来书，以所著〈海国图志〉见寄，赋此奉报，即题卷端》。

### 结语

立足于上面种种证据，1936 年孙殿起曾见到“《海国图志》五十卷，附图一卷，邵阳魏源撰，道光二十二年刊木活字本”<sup>48</sup>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就像 20 世纪的学者一样，孙氏以叙写作日期为刊行年代，日本学者田野村忠温教授在日本、中国所见 10 种版本的《海国图志》均否定这书有 1842 年版本。<sup>49</sup>今天，我们必须接受《海国图志》初刻本牌记“道光甲辰（1844）仲夏”之说。这是《海国图志》五十卷的刊行年代。在结束这篇短文时，让我们再次感谢朱玉麒先生的贡献，是他把《海国图志》版本研究引领大家有新的认识。

---

<sup>47</sup> 张维屏：《松心杂咏·松心宴集诗》，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3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道光咸丰间刻张南山全集本，第 3 页 b；李明哲、李珂：《龙树寺与宣南诗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第 12 页。

<sup>48</sup> 孙殿起录：《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第 184~185 页、

<sup>49</sup> 田野村忠温《『海国图志』版問題新論—從來未知の版區別の発見とその含意—》（刊载于《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 63 卷（2023 年 2 月），第 119~130 页。